

二十世紀儒學大師文庫

龔道耕

儒學論集

龔道耕 著
李冬梅 選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十世紀儒學大師文庫

龔道耕

儒學論集

龔道耕 著

李冬梅 選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責任編輯:何 靜
責任校對:高慶梅
封面設計:墨創文化
責任印制:李 平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龔道耕儒學論集 / 李冬梅選編. — 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 2010. 4

(二十世紀儒學大師文庫)

ISBN 978-7-5614-4783-3

I. ①龔… II. ①李… III. ①儒家—文集 IV.
①Z126-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0) 第 055806 號

書名 龔道耕儒學論集

著	者	龔道耕
選	編	李冬梅
出	版	四川大學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環路南一段 24 號 (610065)
發	行	四川大學出版社
書	號	ISBN 978-7-5614-4783-3
印	刷	成都東江印務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張	22
字	數	476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	0 001~1 500 冊
定	價	62.00 圓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讀者郵購本書,請與本社發行科
聯繫。電 話: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郵政編碼:610065

◆本社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
寄回出版社調換。

◆網址:www.scupress.com.cn

總序

編委會

一

儒學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它孕育於古老的中國文化，也深刻地影響和作用於整個中國古代的歷史和社會。

春秋末期，孔子創立私學，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於是形成“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漢書·藝文志》）的儒家學派，開啟了古代中國學術文化的“軸心時代”。儒家創立伊始，即具有以六經為代表的文獻體系，以“仁義”為核心的理論體系，以“順陰陽、明教化”為功能的價值體系，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正宗的信仰體系和以孔子為祖師的學派特徵。一句話，儒學一開始便具有豐富的學術內涵和明顯的治世功能。

儒家的創始人孔子，以布衣之身而有非凡之思，他集虞、夏、商、周優秀文化之大成，總《詩》、《書》、《禮》、《樂》、《易》、《春秋》以為“六經”，託茲舊籍，寓以“仁義”、“誠信”、“中庸”、“忠恕”之精神，創立儒家系統理論，為人楷模，垂教萬世。從此之後，經過孔子整理刪訂的中國上古典籍，就成為儒家淑世濟人的經典教材。六經（後世演繹為十三經）既是儒家覺世牖民的教典，也是歷代學人闡發儒家思想、寄託慧心玄思的安身立命的經本。歷代學人的智慧結晶和辛勤著述，構成了數以萬計的以十三經為主體的儒學文獻體系。以孔子刪訂六經為標誌，中國前此兩千五百年的上古歷史得以講明，後此兩千五百年中華民族的智慧得以啟迪。六經是上下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橋梁與指南，也是認識、研究中國上古、中古和近古歷史文化所必不可少的讀本和依據。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六經就無法講解中國的古代歷史，離開孔子就無法





認識中國的古代社會。

戰國時期，孟、荀繼起，“學”、“思”二派，角力爭先，或暢言“仁義”，或肆談“禮樂”，儒學思想體系和理論構建漸趨完備，於是儒學成為領先諸子而又啟迪諸子的一代“顯學”。繼而秦政“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儒學遭遇禁錮，儒生備受打擊。漢初布衣將相，厚重少文，崇尚“黃老”，實行“無為”，儒學於是一度消沉。至董仲舒、公孫弘出，儒學包容諸子而又取代諸子，頓顯其治國安邦、訓世覺民之新姿態。漢武帝推行積極有為的政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經學遂成為當世“國教”，儒家“忠孝”、“禮義”、“仁民”、“愛物”等理念逐漸滲入政治、經濟等民生領域，發揮其端正民心、諷喻世教的作用。自此之後，兩千餘年，後儒沿波，各呈意態，直至晚清，儒家思想一直是指導古代中國學術文化和思想倫理的指南北斗。儒家學說作為中華學術的主流和正宗，也一直是中國古代教育和科舉選士的主體內容。從中央的太學（或國學），到地方學府（府學、州學、縣學）和民間書院，儒家經典及其思想都得到了認真傳授和大力闡揚。誦習儒家經典，踐履儒家倫理，提倡忠孝仁義，服膺《詩》、《書》、《禮》、《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追求君子人格，實現信義和平就成了歷代有識之士矢志追求的理想人生，也為民衆樹立了判斷是非的千古不易的準繩。

一部中國歷史，既是儒學不斷影響中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歷史，也是儒學在這一歷程中接受各種文化回饋、應對各種需求（甚至挑戰），不斷發展壯大自己的歷史。歷代統治者，無論是出於維繫萬世基業的需要，或是出於治世牧民的考慮，大多繼承和發展了自西漢以來形成的以太學（或國學）、郡國府州縣學傳播儒學，以察舉或科舉選拔人才的制度。並對儒經的闡釋、儒學理論的發展、儒家學說的實踐，特別是儒家倫理的貫徹，傾注心力，提供條件，形成了風格獨特、千古一系的以儒學文獻、儒家經學、儒家學術、儒學思想、儒學文化、儒學倫理等為內容的有機學術體系，構成中華文化的主流和中堅。儒學在教育士子、鑄造民族性格、豐富祖國文化、形成中國特色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儒學，既是指導中國社會發展的正統思想和實踐倫理，也是自身具有系統理論、豐富內涵和博大文獻的經典之學、系統之學。它既是治術和學術，也是政典和教典；既是中國人的思想源泉，也是中國人的主體思維。它與佛、道二教以及各民族的傳統文化一道，構成了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自兩漢以迄晚清，概莫能外。回顧歷史，服務未來，作為中華胄裔的當代學人，又焉能妄自菲薄，數典忘祖！

二

歷史降至十九世紀末葉，中國儒學一花獨盛的歷史瞬間成為明日黃花。列強進逼，“西學”東漸，中華民族信守了兩千餘年的核心價值觀念搖搖欲墜，



中華民族固有的精神家園也隨之分崩離析。孔廟被拆，書院轉制，尤其是民國初年全盤接受西方教育體制，儒家經學從教學計劃中被刪除，儒家思想在學術領域被批判。從此之後，中國的教育界很難看到儒家經學那熟悉的身影，中國的學術史上也再沒有儒家神聖的地位。漸漸地，也是令人痛心，中國儒學被醜化，被虛化，被肢解，甚至被遺忘。更有甚者，儒家經典被指為偽書，儒學文獻被誣為垃圾，儒學倫理被拋諸腦後，儒家學說被掃地出門，實為空前所罕見、亙古之未有！中國儒學在自己的國度裏頓時成為游魂野鬼，了無“血食”、“寄身”之所！現行的所有學科設置、圖書分類和項目管理體系中都沒有中國儒學的地位！

回顧二十世紀與中國儒學有關的學術活動，大致可以分為五種類型：一是對儒學及其經典持懷疑和反省態度的“疑古派”；二是對儒學及傳統文化抱反對和決絕態度的“反孔派”；三是對儒學抱發展和改造態度的“新儒家”；四是突出儒學的信仰價值，必欲變儒學為宗教的“孔教派”；五是對儒學及其經典進行純學術研究的“研孔派”。

“疑古派”和“反孔派”在二十世紀初期曾經是中國學術的主流，至六七十年代“文革”時達於高潮。他們非毀詩書、鄙視仁義、拋棄禮樂、懷疑經典、批判聖賢、叛離傳統，視儒學為一切腐朽落後的總代表，恨不得將儒家經典“拉雜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在對待“中國儒學”學科建設和學術傳承與發展等方面，自然不感興趣。他們之中雖然不乏“著作等身”之人，但從建設角度看，卻是“風疾馬良，去道益遠”，南轅北轍，乏善可陳。

出於對疑古、反孔的反動，“新儒家”運用近代西方思想學術來更新儒理、發展儒學，必欲使儒學適應並服務於當代和未來社會，此亦古來儒學發展未有之新境界，從而促進了儒學學理的自身建設。“孔教派”從宗教的角度審視和發展儒學，他們借鑒西方宗教理念，必欲將儒家發展成儒教（或孔教），對加強儒學信仰、完整保存儒學自身體系有所助益。“研孔派”則從純學術史角度，對儒學及其經典進行研究和考述，對認識儒學的本來面目、歷史狀況大有裨益，客觀上為恢復“中國儒學”的完整性提供了幫助。下面即簡述後三派的主要活動。

二十世紀初期，劇烈的社會變革使中國儒學遭受空前大難，雄峙東方兩千餘年的儒學大廈轟然坍塌，儒學統治中國的時代遽然終結，嚴格意義上“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的傳統儒家已經不復存在。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聲浪中，梁漱溟等人挺身而出，為孔子辯護，揭起儒學復興的旗幟，成為“現代新儒家”的前驅。隨後，經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勱以及馮友蘭、賀麟等學人的不懈努力，“現代新儒學”發展成為二十世紀中國的重要思潮之一，在學理上帶來了儒學的革新，形成“新理學”、“新氣學”、“新心學”、“新實學”等新儒家學派，大大提昇了民族自信心，為當時的民族自強以及隨之而起的抗日救亡運動注入了新鮮空氣與活力。



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初，現代新儒學在中國大陸已經失去市場，於是轉移至中國香港、臺灣地區延續其生命，主要代表人物有錢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方東美等。他們以接續和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有感於中華文化之“花果飄零”，他們深情地呼籲：在強勢的西方文化面前，應該完好地保留中華民族優良的文化傳統和國民精神。他們著書立說，四處講學，身體力行，宣傳儒理，在世界一些主要國家和地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們最具影響的活動是共同簽署和發表了《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書》，即“中國文化宣言”。

七八十年代，是現代新儒學的復興期。從1980年起，後現代主義思潮流行，認為西方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實用主義等片面強調工具理性，忽視價值理性和對人的終極關懷，有損於人類幸福和長久和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以來，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經濟的迅猛發展，引起了“儒家資本主義”概念的流行。中國大陸蠻橫無理的“批孔”“批儒”引起的逆反心理，使得大陸部分學人與香港、臺灣地區現代新儒家聲氣相通，從而推動現代新儒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此期主要代表人物有杜維明、劉述先、成中英、蔡仁厚等。不管其政治主張如何，現代新儒家積極謀求儒學現代更新，主張中華文化的自我本位，喚醒了中華民族文化的主體意識，同時也為儒學現代更新和發展作出了積極思考，這無異於使儒學這棵千年古樹催生出無數新枝嫩芽，展現出無限生機和光明前景。

“孔教派”從觀念上講，往前可以追述到明末西方傳教士大量進入中國後引起的中西文化和信仰之爭，而“孔教”一詞的正式提出則始於二十世紀初廖季平、康有為、陳漢章等人。廖氏出於對孔子的尊大，正式發表《孔教哲學發微》，提出以孔教統天下一切學術；康氏則有感於維新變法失敗、西學大量東漸，以為是中國缺乏宗教信仰所致，於是發表《以孔教為國教配天議》，認為定孔教為國教，使“人心有歸，風俗有嚮，道德有定，教化有準，然後政治乃可次第而措施”；其弟子陳漢章等人起而和之，成立孔教學會和孔教學院，於是“孔教”形成一時熱門話題。至八十年代，任繼愈先生再提儒教問題，其弟子李申更撰著《中國儒教史》、《儒學與儒教》、《中國儒教論》等系列專著，將這一討論推向深入。這一問題在海外也有激烈的爭論，至今方興未艾，其觀點也是多種多樣、五花八門。他們認為，儒學具有宗教性，具有超越性和終極性，也具有其他宗教性因素，在中國歷史上起到過宗教的作用。也有人認為儒教與其他宗教不同，它只是道德教、人文教，肯定儒學仍然有現代意義。當然，也有人認為儒學是封建社會的宗教，已經成了博物館的歷史收藏物，從而否定儒學仍然具有現代意義。

“研孔派”則多半是在儒學信仰得不到滿足情況下的轉型，章太炎曾論清學曰：“多忌，故歌詩文史楷；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湊於說經，亦以紓死，而其術近工眇眇善矣！”“研孔派”的作為正與之相似，不過



不是“說經”，而是“說史”了。這一派中，老一代學人如蒙文通、白壽彝、金景芳、張岱年等先生，大多走過“由經學而史學”的道路，他們早年在儒家經學、孔學、易學以及宋明理學等領域都有精深的造詣。隨着經學學科退出歷史舞臺以及近代教育的轉型，這批學植深厚的專家學人，不得不將精力轉入純歷史的或儒學史、經學史的研究，角色也從當初的信孔、尊孔轉為研孔，即使是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們也不忘為孔子和儒學說幾句公道話。改革開放後，從1979年始，在中國大陸逐漸形成研孔熱潮。1985年在中華孔子研究所（中華孔子學會的前身）成立會上，張岱年慎重宣佈：“盲目尊孔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盲目批孔的時代也過去了，現在應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研究孔子和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此後研孔文章日益湧現，研究專著越來越多，特別是具有革命家、教育家雙重身份的匡亞明先生出版了《孔子評傳》，該書以翔實的史料、嚴密的邏輯、新穎的見識、深刻的分析，塑造了孔子這位品德高尚的偉大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的形象，實開啟正面研究儒學之先聲。此後同類的著作有：綜合性的如趙吉惠等《中國儒學史》、《中國儒學辭典》，劉蔚華等《中國儒學思想史》，龐樸主編《中國儒學》等；專題專經性研究，則有金景芳《學易四種》、《孔子新傳》（合著），劉起鈺《尚書學史》，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等，對儒家經學及其思想進行了深入研究和總結。

特別是二十世紀後期，一批年青學人登上學術舞臺，在專門學術史研究方面做出可喜的成績，出版了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廖名春、梁韋弦、康學偉《周易研究史》，洪湛侯《詩經學史》，趙伯雄《春秋學史》，林忠軍《象數易學發展史》，姜林祥、王鈞林等多卷本《中國儒學史》，等等。真是後來居上，異軍突起，斐然可觀。這些著作既是對儒家學術史的研究，也是對儒學學科整體形態的呈現，為儒學學科的恢復提供了歷史的和學術的支撐，為儒學研究“春天”的到來廓清了迷霧。

三

放眼當今的學術界，中國儒學的命運已經有了很大改觀，一場“文化復興運動”正在蓬蓬勃勃地開展，風雲際會，中國儒學學科建設的呼聲也越來越強烈。我們高興地看到，先是由民間自發組織，後是由政府主辦的“祭孔大典”越來越隆重，由國家出資興辦的“孔子學院”遍佈五洲四海，國內一些高等院校（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四川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山東大學、廈門大學、上海師範大學等）也紛紛成立儒學院（或國學院），一些有條件的高校還設立“中國儒學”博士點，正式公開招收儒學專業和以儒學為教學內容的本科生、碩士生和博士生。儒學這門古老而又日新的思想學術再度步入淑世濟人的大學校園，儒學研究、儒學教育以及儒學學科建設的問題再次被提到中華學人的關注視野和有關管理部門的議事日程。

1997年四川大學啟動《儒藏》編纂工程，在儒學文獻系統整理和獨立體系構建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四川大學和中國政法大學等高校，為適應儒學人才培養的需要，還籌劃和組織了“儒學教材”的編纂，一套全面反映儒家經典、儒學歷史、儒學思想、儒學文獻、儒學文化以及儒學文選的系列教材正在醞釀之中。它們的編成和出版，必將對儒學的復興和再度興盛起到積極的作用。

瑞典科學家漢內斯·阿爾文博士曾經預言：“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繼續生存下去，必須倒回兩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既然人類有此需求，儒學在二十一世紀也就有了復興的理由和希望。儒學學科的回歸和重振，應該指日可待，為期不遠矣！套用毛澤東同志的話，儒學復興“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儒學具有合乎人性、潤乎人心的系統理論，其追求社會和諧、實現世界和平的理想，無疑具有超乎國家和種族的普世價值，特別是儒學自身具有兩千五百年的發展歷史，我們對儒學的再度復興沒有理由不抱樂觀的態度。

當然，這種可能也正如當年毛澤東同志所說只是“快要”而已，其間還有很長的路需要我們去走，包括對儒學歷史進行全面系統的回顧和研究，對儒學成果進行完整的收集和整理，對儒學學科體系進行全新的重組和構建，等等。我們正在從事的《儒藏》編纂和研究事業，正是一部收集和整理儒學發展歷史和學術成果的大型叢書，它收錄了上自先秦、下至清末的儒學成果和史料，可為儒學的當代復興和發展提供最齊全的資料。

如果說《儒藏》反映的還是儒學古代成就的話，那麼這套“二十世紀儒學大師文庫”則是《儒藏》的續編，它是一部收集和整理近代、現代儒學研究成果的資料寶藏。其作者包括部分從十九世紀進入二十世紀的人，也有個別作者跨入了二十一世紀，但其成果主要發表在二十世紀之中。本文庫所收錄的基本上是二十世紀的成果，上可與《儒藏》相銜接，下可啟二十一世紀儒學發展之新知。它是承上啟下的橋梁，也是溫故知新的土壤。

二十世紀，風起雲湧，世事變遷，靡有常態。大致說來，前半葉天造草昧，雲雷混沌，由於世勢日非，國是莫定，文化陵夷，儒學自然不振；後半葉處於新舊體制交替之中，缺乏經驗，文化重建創新不足，優秀傳統繼承不夠。整個二十世紀，除了改革開放後二十年儒學稍有重振氣象外，儒家與經學，不是被打倒和誣詆，就是被忽略和荒廢。幸而尚有一批有學識、有良知的老前輩，仍然不離不棄，無怨無悔，耕耘不輟，猶如萬綠叢中的一點丹紅，使傳統儒學領域尚存幾許生機，不致一片荒蕪。這是中國文化之幸，中國歷史之幸，也是後學晚生綿綿瓜瓞、薪火傳承之大幸！收集整理、總結研究這些成果，回想這些碩學大師們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仍然堅守儒學的精神家園，其成果可資借鑒，其精神更是令人欽佩！後之繼起者，當以此為階梯奮力前行！

序

近代“蜀學”曾經給中國儒學帶來新氣象，並將中國儒學引入新階段，值得人們好好研究，仔細品味。在近代史上，引領和促成近代“蜀學”的中心機構，是當時的“兩院兩堂”（錦江書院和尊經書院，中西學堂和存古學堂）以及後來由“兩院兩堂”發展而成的四川大學。“兩院兩堂”分別代表了近代學校的三種類型：為科舉而設的舊式學校（錦江書院）；為通經學古而設的傳統書院、專門學堂（尊經書院、存古學堂）；為傳授近代科學而設的新式學堂（中西學堂）。^① 它們基本因應了當時社會變革和轉型的需要，培養和聚集了大批傑出人才。在此基礎上組合而成的四川大學，更是兼得傳統與新學之精神，兼有義理、考據、辭章和科學四長。近代四川的傑出人士大多由“兩院兩堂”及四川大學所培養，如駱成驤、廖平、楊銳、劉光第、宋育仁、吳之英、張森楷、吳玉章、郭沫若、蒙文通、向宗魯等等^②，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兩院兩堂”及四川大學就是近代“蜀學”的中心和策源地。

不過，在“兩院兩堂”和四川大學之外，還有一批“蜀學”人士也相當出色，不可小覷。他們或出於縣級“學校”，或出自鄉間“書塾”，雖然門閥不高、出身不顯，但在學術上的貢獻却不小，也產生過重要影響，他們無疑也是近代“蜀學”的組成部分，有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天才早慧，學貫四部，旁及道佛，著書二百三十五部的著名學者劉咸炘（1896—1932）；學識廣博，精熟《倉》《雅》，雅意經史，著述達一百四十餘種的龔道耕（1876—1941）；精熟文獻校勘，詩文書法俱佳的龐石帚（1895—1968）。他們都出身書塾或蒙館，學術造詣並不亞於“兩院兩堂”所造就的人物。其中堪稱“蜀學”重鎮的龔道耕，曾任四川多所中學、大學校長和四川大學、華西大學教授，人稱“著述行天下，弟子徧蜀中”，是近代四川不可多得的教育家和學者。其人學問淵博，樸實謹厚，不趨新而炫世，亦不隨眾而媚俗，在以廖平為代表的“今文經學”大張赤幟、大行其道之時，龔先生却注重小學、力標

① 舒大剛：《晚清蜀學的地位和影響》，載《社會科學研究》2007年第3期，165～170頁。

② 即使主要活躍在科學、音樂、文學等領域的周太玄、王光祈、李劫人、魏時珍等人，也有極深的舊學功底，深受“蜀學”的黑陶。

“鄭君”，在“今文”學派之外獨標一幟，形成與廖氏學術互異而又互補的氣象，從而構成了近代“蜀學”的完整概念。研究近代四川“蜀學”，當然少不了對龔道耕其人其學的研究。然而，在近世的研究中，他確確實實被人們忽略了，至今不見關於他的專門論文發表。故借《龔道耕儒學論集》編撰、出版之際，擬對其生平及學術聊作探討，冀以見近代四川不拘一格造就人才之一斑。

一、龔道耕生平述略

關於龔道耕生平的記載，其初有其長孫龔讀籀（師古）撰《學行述略》^①、友人龐石帚（龐俊）撰《墓誌銘》^②及《記》^③；繼之又有門人潘慈光^④、姜亮夫^⑤、外侄唐振常^⑥及周積厚^⑦、朱旭^⑧、吳曉鳴^⑨等所撰回憶文章和志傳。現以龔讀籀《學行述略》為主，而以諸氏文參之，略述龔氏生平於次。

龔道耕（1876—1941），字向農（一作相農），一字君迪、悲庵，別署蛛隱，晚因重聽，又自號聵翁。龔氏原籍浙江會稽，“家牘傳承，蔚爲士族”（《墓誌》）。清乾隆年間，七世祖名貽經（號“受易公”）者，官四川長壽縣典史；八世祖德（號“湘浦公”），“耆儒不仕，就養入蜀”（《墓誌》）。時值黔西李世杰總督四川，湘浦公素與之交，應招入幕，於是始來成都，樂其土風，遂

① 龔讀籀：《先王父向農府君學行述略》（以下簡稱《學行述略》），載《志學》第6期，1942年，14～16頁。按：據龔師古（讀籀）先生親告筆者，該文係殷孟倫先生代撰，其中所論多當時之公言，並非一家之私情。

② 龐石帚：《成都龔向農先生墓誌銘》，載《成都大學學報》（社科版）1987年第4期，60頁。

③ 龐俊：《記龔向農先生》，載《國文月刊》第58期，開明書店，1947年，31～33頁。按：初稿曾載《志學》第6期，12～14頁。

④ 潘慈光：《龔向農先生傳》，載《國史館館刊》第1卷第3號，1948年，219～221頁。

⑤ 姜亮夫：《學兼漢宋的教育家龔向農》，見《四川近現代文化人物》，117～125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⑥ 唐振常：《記一代經學大師龔向農先生》，載《文史雜誌》1990年第4期，8～10頁。又題《憶舅父——記一代經學大師龔向農先生》，見《往事如煙懷逝者》，3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下稱《憶舅父》。

⑦ 周積厚：《龔向農先生生平事略》，載《金牛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1987年，18～24頁。

⑧ 朱旭：《龔道耕》，載《四川近現代人物傳》第4輯，227～230頁，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

⑨ 吳曉鳴：《悠揚弦歌與蜀中大儒——成都縣立中學校歌與校長龔向農》，見《墨光百載紀華年：成都七中校友回憶錄》，175～178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定居焉^①，爲成都人。祖玉彬，官廣西平南知縣；父藩侯，清候補知縣。龔氏家世業儒，薄於宦情，而精於學術。其祖在平南知縣任，雖“治行卓異”，却“遂高止足，棄官而歸”（《墓誌》）；其父雖有候補資格，却不急於求進，而“博學開敏”（《墓誌》）。這是一個十足的書香之家，爲造就一代大儒准備了充分條件。

龔藩侯生有七子，道耕居其長。其幼而聰慧，三歲即由母“口授唐賢絕句，輒一聞能默誦”。八歲能屬對，聲律克諧，能引用李白詩句以答詰難，一時號稱“神童”（或稱“聖童”）。十三歲，補成都縣學生員。十四歲，已讀完羣經、諸子，兼及史部。因讀江藩《漢學師承記》，喜其淵源明晰，遂鍾情漢學，自謂平生治學皆根於此。十七歲，中光緒十九年（1893）副貢。二十六歲（1901），中舉人。後援例入貲，授內閣中書，但却無意做官，遂歸故里。

光緒末年，清廷明令廢科舉，立學校。金壇馮煦（1843—1927，字夢華，號蒿庵）以四川按察使兼主學務處，聘蜀中名流襄理辦學諸事，道耕得與其間，此其涉足教育業之始。父龔藩侯創辦成都縣小學，道耕亦參贊其事。從此與教育結緣，平生精力，皆專注於作育人才，主講於四川官私中學、大學，垂四十年，弟子成學者，不下數千人。當時談論蜀中教育的，沒有不稱數龔某其人的。

龔道耕教育生涯，在清末做過官立四川優級選科師範學堂監督。人民國後，又歷任四川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眉山縣立中學、成都縣立中學校長。民國十五年（1926）起，先後代理國立成都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國立成都師範大學校長。曾於民國四年（1915）、民國十七年（1928）前往北京和南京參加教育會議。1931年國立成都師範大學與公立四川大學、國立成都大學合併成立國立四川大學，龔道耕乃卸師大校長任，專任四川大學、華西大學兩校教授，主講經學。

龔道耕盡心教育，是一個稱職的校長，也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長選科師範時，“蜀中兵禍相尋更十餘歲，學風敗壞，經費拮据”，道耕每月只領車馬費，“自損俸給，躬以率下，爲諸生勉訓無不至”。長師範大學時，“經費尤奇絀”，道耕爲償債務，捐出自家數十畝田產，“獨肩其難，竟以校債致破產”。民國時兩次參加全國教育會議，“於教育改革，多所建議”，並順道“考察京、

^① 龐石帚《成都龔向農先生墓誌銘》謂：“清嘉慶間，有諱貽經者官長壽典史，厥考祖德，老儒不仕，就養入蜀，會故人黔西李恭勤公世杰總督四川，請參幕府，暫游成都，樂其土風，乃定居焉。”龔讀猶《學行述略》記其入蜀無具體年代。龐氏謂龔氏祖先於嘉慶間始入蜀，不確。按：李世杰（1715—1794）字漢三，貴州黔西人。《清史稿》卷三三四有傳。傳載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捐貲授知縣銜。歷知州、知府、鹽驛道、按察使、布政使、巡撫，至總督、兵部尚書、太子太保。五十六年（1791），致仕回籍。五十九年（1794）三月卒，年七十九，謚恭勤。李氏曾兩爲四川總督，一在乾隆四十九年，一在五十二年，其卒於乾隆五十九年。可知龔氏祖先入李氏幕府只能在乾隆時期，其入蜀也應在此時。



滬、寧、漢諸校”的教學狀況。他學識淵深，博聞強記，“過目不忘，所讀書，至老成誦”，世多以王應麟比之；“每升堂為諸生講授，口所疏舉，淹洽通貫，繁簡得中，諸生記錄，反手不及追”。他“誨人不倦，弟子多踵門受業”，如姜亮夫、殷孟倫、徐仁甫等著名學人，“業成去者，終身服膺”，至老猶撰文誦其德^①。道耕為人貌豐腴，愷悌慈祥，談吐詼諧，妙趣橫生。而且多材多藝，嗜飲善曲，偶一興至，則引亢擊節，自娛自樂。嘗對人說：“不能飲酒度曲者，非吾徒也。”

當然，龔道耕更主要的特徵還是一個讀書人，一個學問家。“自以名家年少，素多藏書，有園池之勝”，而不作紈袴之游，却“發奮力學”（龐氏《記》），“日惟咿唔展翫，於意豁如”。晚年值抗戰爆發，四川大學遷至峨眉山麓，“家用稍不贍，然澹泊自若，不改其操”。尤嗜著書，“年十四五，即好著述；未及三十，成書數十種”，中年以後，亦不自廢。（徐仁甫《著述目錄》）

民國三十年（1941），道耕援例休假，擬全身心投入學術研究，造作《禮記鄭氏義疏》。當年，四川大學設立文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學校擬聘請道耕為諸生導師，未及赴任而中風暴卒，享年六十六。

道耕人品、學問俱佳，為世所敬。姜亮夫說：“先生於學為大儒，於行為大師，則兩肩道義，經師人師，為完人矣哉！”又說：“學識人品，俯仰不愧所業，門人弟子與時人皆奉為大儒、純儒。”“民國以來，蜀中軍人跋扈，唯先生與華陽林先生山腴（思進），雖悍將驕卒不敢無禮，非大德不足以服暴也。”^②

二、龔道耕著述考略

龔道耕少年天才，勤於著述。龔讀籀《學行述略》云：“府君於學無所不窺，早歲治小學考據，及《流》《略》纂輯。年十七，已有《釋文敘錄集證》之作。嘗輯補《倉頡篇》、《字林》之屬，已梓行世。又校輯古佚子為《最錄》，得若干種。”

龐石帚《記》謂：“（道耕）發奮力學……仰取俯拾，日有造述。年未三十，成書數十種，由是知名。”《墓誌銘》：“甫逾立年，造述有斐，肩篋至數十種。”

徐仁甫《著述目錄敘》亦謂：“先生年十四五，即好著述，未及三十，成

① 姜亮夫《謝本師——學術研究方法的自我剖析》云：“我一生從事學術研究，一般都是圍繞着他們的教訓，走我自己願意走的路。其中林山腴和龔向農兩位先生教我的是基礎知識、根柢之學。有了堅實的基礎，我才能向其它方向發展。”（《浙江學刊》2001年第4期）

② 姜亮夫：《學兼漢宋的教育家龔向農》。

書至數十種。”

龐《記》後附有《龔先生遺著目錄》，徐仁甫則專門編有《龔先生著述目錄》，發表於《志學》第6期。今依二目，按經、史、子、集分類，著錄於次：

經部，19種：

1. 《唐寫殘本尚書釋文考證》（華西大學印行^①）
2. 《尚書篇第表說》（未印）
3. 《喪服經傳五家注》二卷（輯本，未印）
4. 《禮記舊疏考正》（見《〈禮記鄭氏義疏〉發凡》）
5. 《葉輯禮記盧注疏證》（同前）
6. 《孝經鄭氏注》一卷《敘錄》一卷（輯本，未印^②）
7. 《三禮述要》（已印^③）
8. 《經典釋文敘錄集證》（未印）
9. 《經學通論》（已印^④）
10. 《經學沿革史略》（未成）
11. 《訓詁學》（未成）
12. 《說文逸字箋記》（未印）
13. 《倉頡篇續補》一卷（家刻本^⑤）
14. 《字林重訂補遺》一卷《附錄》一卷《校誤》一卷（家刻本^⑥）

① 《唐寫殘本尚書釋文考證》，成都華西協合大學哈佛燕京學社，1937年1月；又略載《華西學報》第4期、第5期及第6、7期合刊本，1936年6月、1937年12月、1941年6月，1~18頁、51~65頁、18~32頁；又略載彭裕商、舒大剛主編，張尚英副主編：《川大史學·歷史文獻學卷》，27~36頁，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

② 按：《志學》第25期卷末“本刊啓事”云：“本刊叢書，籌印伊始，已出版者目如下：《孝經鄭注》（龔向農輯，刊刻中），《中國文學史略論》（龔向農撰），《唐寫本尚書釋文考證》。”是《孝經鄭注》、《中國文學史略論》、《唐寫本尚書釋文考證》皆有刻本傳世。另據彭雄“聽鄧代昆兄聊天”博文中記有成都趙明藏有“龔道耕先生手稿本《孝經鄭注》及民國年間此書的木刻本”，知《孝經鄭氏注》確有手稿本及木刻本存世。現查手稿本已售往北京，木刻本仍存於趙明手中。

③ 按：《志學》第19、20期合刊本有羅孔昭《逸禮經記考略》，題下夾注云：“壬午補《三禮述要》。”又《志學》第11期載有羅孔昭《三禮述要補敘目》。據羅孔昭云，《述要》乃龔氏“隨手編次，亦未成書”，故當未印。

④ 《經學通論》，有1927年成都刻本、1929年成都維新印刷局三版重印本、1947年成都薛崇禮堂刻本等多種。

⑤ 又名《倉頡篇補本續》，有清光緒二十三年成都龔氏襄馨精舍刻本、清光緒二十三年成都龔氏襄馨精舍刻民國二十三年渭南嚴氏補刻本。

⑥ 家刻本作《字林考逸補遺》一卷《附錄》一卷《校誤》一卷，有光緒丁酉成都龔氏襄馨精舍刻本、渭南嚴氏刻本。



序



15. 《字林補本》（渭南嚴氏刻本^①）
16. 《慧琳一切經音義節本》九卷（未印）
17. 《希麟續一切經音義節本》一卷（未印）
18. 《玉篇檢部》一卷附《廣韻標目》（未印）
19. 《唐宋元明韻譜異同表》（未印）

史部，21種：

1. 《史記正義佚文節本》（未印）
2. 《補宋書宗室世系表》（未印）
3. 《宋書簡端記》（未印）
4. 《讀南齊書記》（未印）
5. 《讀梁書記》（未印）
6. 《舊唐書補校》（一名《舊唐書札迺》，《華西學報》已印，未完^②）
7. 《明史稿明史流賊傳校異》（未印）
8. 《讀續通鑒筆記》（未印）
9. 《輯通鑒長編成都縣事》（未印）
10. 《纂輯七錄稿》二卷（未印）
11. 《最輯鄭君別傳》（未印^③）
12. 《鄭君年譜》（《重光雜誌》已印^④）
13. 《孔北海年譜》（《志學》已印^⑤）
14. 《管北海年譜》（未成）
15. 《孟子弟子目錄》（已印^⑥）
16. 《鄭君著述目錄》（未印^⑦）

① 據1993年7月由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中華書局出版的《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小學類》收錄的孫海波先生為龔氏《字林補本》一卷所作的提要，《字林補本》實際為龔氏《字林考逸補遺》，只是題名不同而已。

② 《舊唐書札迺》，原載1941年6月《華西學報》第6、7期合刊本，至“本紀”部分而止。全書至1990年4月由四川大學出版社據殷孟倫鈔本整理出版。

③ 《最輯鄭君別傳》，載《志學》第17、18期合刊，1945年3月15日，7～9頁。

④ 《鄭君年譜》，近世諸家年譜、辭典均未著錄，連載於《重光》1938年第三期、第四五合期、第六期。姜亮夫《學兼漢宋的教育家龔向農》云：“鄭君年譜，余所見十餘家，黃奭《高密遺書》前所附為上，然詳而無剪裁，或略而苦寂無義趣，惟先生所譜詳簡適當，評鶩精慎。”

⑤ 《孔北海年譜》，據徐仁甫目云《志學》已印，然筆者徧查《志學》諸期，均未見此文，不知何故。

⑥ 《孟子弟子目錄》，載《志學》第6期，《龔向農先生逝世紀念專號》，1942年6月15日，6～9頁。

⑦ 《鄭君著述目錄》，載《志學》第13期，1944年10月15日，7～9頁。

17. 《水經注引用書目》（未印）
18. 《蓬園藏書目錄》（未印）
19. 《大清會典要義》（未印）
20. 《帝範臣軌合編》（未印）
21. 《中國文學史略論》（已印^①）

子部，24種：

1. 《魯連子》（以下輯佚，均未印）
2. 《桓氏世學論》
3. 《蔣氏萬機論》
4. 《杜氏體論》四卷
5. 《杜氏篤論》二卷
6. 《仲長子昌言》三卷
7. 《魏文帝典論》一卷
8. 《劉氏政論》
9. 《崔氏政論》
10. 《四民月令》^②
11. 《陸氏典語》
12. 《袁氏正書》二卷
13. 《袁氏正論》一卷《附屬》一卷
14. 《佚子最錄》四十四種
15. 《淳熙本顏氏家訓校記》（未印^③）
16. 《讀書笈》（未印，以下同）
17. 《讀書日箋》
18. 《蛛隱廬日箋》^④
19. 《新雜俎》
20. 《浣縉隨筆》

① 《中國文學史略論》，有1925年成都薛崇禮堂刻本、1929年成都饒梨齋刻本、1940年成都建國中學印本、1945年成都薛崇禮堂刻本等多種。

② 《四民月令》，載《國學叢編》第10期，1917年10月。

③ 按：嚴式誨《顏氏家訓補校注序》云：“成都龔向農、華陽林山腴兩舍人皆篤嗜是書，各有箋識。戊辰孟春，余重刊廬本，凡學士補注重校各條，悉散入本文，據以改補。”又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引用龔說頗多，知應有稿本傳世。

④ 按：中華書局標點本《梁書·元帝紀》（1973年版）“校勘記”〔一六〕云：“卦起龍圖：‘卦’各本誤作‘封’，據龔道耕《蛛隱廬日箋》（稿本）改。”又《宋書·殷孝祖、劉勉傳》“校勘記”〔一六〕云：“豈有捐軀衛主：‘軀’各本並作‘驅’。龔道耕《蛛隱廬日箋》云：‘驅當作軀。’按龔說是，今改正。”等等。知《蛛隱廬日箋》尚有“稿本”傳世。

21. 《僮籥》
22. 《野聞綴錄》
23. 《觀生夢憶》
24. 《日記》

集部，4種

1. 《研六廬詩文初稿》（以下未印）
2. 《庚子叢稿》
3. 《蛛隱廬文存》
4. 《丁未述徵集》

以上龔氏著述，係據龐石帚（俊）和徐仁甫（永孝）的著錄而列，共有68種。龐石帚（1895—1968）是四川大學著名教授。民國時期，龐氏、龔氏與趙少咸、向楚被稱為當時四川大學文學院的“四大教授”。龐氏與龔道耕多年共事，又是最要好的朋友，他對於龔氏的了解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龔氏去世後，龐氏還為之作《墓誌銘》，繼之又撰《記龔向農先生》一文予以紀念，《龔先生遺著目錄》正附於《記》文之後。徐氏（1901—1988）乃龔先生得意門生，從學多年，晚亦在側，對老師的了解也不應有誤。因此，以上著錄似乎應該是龔氏著述的全部情況了，但其實却不然。

當我們廣徵文獻加以考核時，就會發現，龔氏著述無論是已成書的，還是未定稿的，都不止這些，仍有許多溢出龐、徐二目之外。究其原因，一則可能因為龔氏著述“多未刊刻”，所以他到底有多少著作，友人、門人也未必盡知。徐氏《目錄敘》云：“（先生）又性不喜表暴，平居恒覆其所有，雖在及門，莫得盡窺，且戒人勿有意著書，故於已作印行者甚少。”

二則，龔氏早年勤於著述，後來因忙於教務，許多想法並未完全實現，給人留下“多未成書”的印象。徐氏《目錄敘》即謂：“壯歲以後，撰述雖不似昔日之勇，然亦未嘗稍廢。特以世受家累，不免牽於人事，故所著述，多未寫定。”有此印象，自然對其著述是否完全也就未及深考了。

其三，徐氏《目錄》發表於《志學》第6期，蓋為紀念而作。徐氏《目錄敘》云：“今年一月，永孝與友人發行《志學月刊》，勸先生以兵燹烽火為慮，便欣然出其緒餘，以餉讀者。……痛昊天之不遺，懼斯文之將喪，刊佈遺著，責無旁貸。於是商得哲嗣仲興世兄之同意，決將先生平生著述陸續發表。茲先出專號，以資紀念，爰立《目錄》，俾觀覽焉。”

當時龔氏及其子答應將遺著“陸續發表”，但並未經系統整理，故徐氏所錄當然就不可能全面。而龐氏之《記》又重在情感上的紀念，所附《目錄》完全過錄徐氏《目錄》（只增少量按語），在徐《目》之外並無新增，因此留下了龔氏著述目錄不全不備的遺憾。